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
资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 编

4

[1945—1949]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四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国外发行 南官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56.75印张 7插页 1307千字

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10355·978

*A Corpus of Data of
Academic Theses and Works
on Lu Xun (1913—1983)*

(1913—1983)

魯迅研究學術論文·著作資料集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四卷 编者说明

- 一 第四卷收录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五年间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
- 二 第四卷对所收集到的鲁迅研究资料继续有所筛选，标准逐平严格，尽量收录在学术理论、史实资料和观点、角度上有新意和参考价值的文献，一般性的纪念文章、重复前人观点的介绍性、讲解性的材料不再收录。
- 三 在第四卷中，有些研究论文专集，继续按成书体例编印，不再按照单篇文章发表时间收录；有些研究论文专集因为单篇论文发表时间相距过长，仍按照单篇文章发表时间收录，编录专集时注明该文章的原载出处和在本书的卷数页码。
- 四 为保持文献的历史原貌，除个别明显错排外，编者一律不予更改。文献中的鲁迅著作和其它经典著作的引文，也照原貌编录，未与原著校核，特再次申明，请读者注意。
- 五 一九四九年七月云南昆明“关于鲁迅”的论争资料，特地约请云南大学中文系蒙树宏同志收集、抄录，概述中有关部分也系参考蒙树宏同志的《“关于鲁迅”在昆明》（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鲁迅研究》第五期）一文写成，特此说明并致以谢意。
- 六 本卷编纂过程中得到云南省图书馆李硕等同志的帮助，特此说明并致以谢意。

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

(1945.9—1949.9)

七

(1945.9—1949.9)

一九四五年九月，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里，鲁迅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九月十日，《国文杂志》第三卷第四期发表了荃麟的《鲁迅的〈野草〉》。这是《野草》研究史上的重要论文，对《野草》的思想艺术特征和鲁迅写作《野草》时期的思想矛盾进行了全面、精辟的分析。荃麟指出：“我们要知道当时鲁迅先生心灵中是在进行着最高度的强烈搏斗，他的情绪上是在起着最猛烈的波动，宛如海涛冲击，此起彼伏：希望与绝望，更生与灭亡，胜利与失败，一切都到达最尖锐的顶点，而从这种搏斗中间，才能使他的思想情感上迸发出各样的灿烂火花。这是一个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当他思想向前突进以前所必然经历的大苦闷，大痛苦，而只有从这种真实的苦闷与痛苦中，才能开放出更灿烂的思想之花。”邵荃麟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鲁迅写作《野草》时期的思想矛盾、精神苦闷与后来的思想飞跃之间的辩证关系，驳斥了认为鲁迅是虚无主义者的论调，把《野草》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九月二十三日、三十日，《民主周刊》第二卷第十、十一期发表了尚钺的《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今日——胜利周年纪念鲁迅先生》。这篇文章运用观念形态的文学是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投其影响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新文学形成的背景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时代特点以及它在今天的发展。在分析方法上有独到之处。

九月二十九日和十月六日，上海《周报》新四、五期发表了许广平的《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献逐条回答了苏联的鲁迅研究专家罗果夫提出的有关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问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指导意义。

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日，重庆进步文化界集会纪念，周恩来、郭沫若等人讲话。周恩来同志希望文化界能参与政治会议，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郭沫若提出了建立鲁迅博物馆等方面的建议。

这一年第四季度，报刊发表了一些鲁迅亲属的回忆录和访问记，具有一定的史实价

3071 1

值，值得注意。这些文献主要是：

周建人的《关于鲁迅的断片回忆》（十月二十日《新文化》创刊号），生动、真实地记述了鲁迅晚年的一些生活细节。

周晔的《伯父鲁迅的二三事》（十月二十日《新文化》创刊号），记述了鲁迅在侄女周晔心中的印象，深夜给车夫治伤敷药一节尤其感人至深。

《文萃》周刊编者的《鲁迅的墓及景宋与海婴近况》（十月二十三日《文萃》第三期），反映了许广平和海婴当时的生活状况和日伪时期人民群众对鲁迅墓的爱护。

海生的《为鲁迅先生的遗族和藏书尽一点力吧》（十二月十九日《世界日报》）和弓也长的《访问鲁迅夫人》等文，客观反映了朱安夫人当时生活的状况，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九四六年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正式发表和出版的鲁迅纪念文章和鲁迅研究论著有四百余篇之多。

但是要在学术理论上取得进展却是不很容易的，在四百余篇文章中对学术研究提供新东西的文献就屈指可数了。值得注意的主要有：

锡金的《摩罗诗说》（一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二卷第三期）。这篇论文着重强调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在鲁迅整个思想发展和文学道路上的重要意义，指出鲁迅“提起自己早期的文字时，总是说值得一看的是这篇论诗人的文字。二十年后，他还说对这几位诗人不能忘怀。可是他的战斗换了方法，他用短小精悍的杂感文字来做武器，而精神依旧是一贯的。所以，鲁迅先生的杂文只是他的‘摩罗诗力’的另一种发扬，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这种‘摩罗诗力’的要求。”认识到《摩罗诗力说》的思想精神在鲁迅杂文中的继承和发展，应该说是有力识的。这篇文章还强调鲁迅是以浪漫主义为起点的，澄清了当时文学界对浪漫主义的一些曲解和浅见，这对于认识鲁迅早期思想的精神实质也是有益的。

王任叔的《鲁迅先生的治学方法》（录自《学习与战斗》，上海杂志公司四月初版）。这篇论文绝不是仅仅一般地谈论鲁迅的治学方法，而是相当深入地剖析了鲁迅的辩证思维方法，揭示了鲁迅既继承前代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又克服其中弊端、汲取新的科学方法的革新精神，指出：清代朴学家们“的历史主义，只做到‘还它本来面目’这一点，而对于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不很关心，因之他们把学问和实社会隔离了开来，学问和学问的相互关联隔离了开来，甚至把某一学问的各阶段隔断开来。所以他们的治学的目标越到后来越只限于考据与训诂之学了。章太炎先生的《方言》，是以方言来考订古音的，那是逆历史主义（复古主义）的做法，要人们倒回过头去写古字，而不是证明古音古字的衍变的必然性，所以直到讲学苏州时，还不断抨击拉丁化新文字。”“只把事物还放在它所产生的时代的‘本来地位’上给它一个‘本来的面目’。此固历史家所应作的事，此或亦朴学精神所在之处，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仅仅做到这一点，是将学者自己停留于彼一时代里，而终于不能有所开展，于现实社会亦毫无补益。鉴往所以知来，历史家与学者的目的，不仅在于记载过去之正确，而尤在于藉此而知现在未来为何若。”“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而这也就是鲁迅先生超越章太炎先生而成为历史的现实主义者的原因。”这些分析都是很精辟

的，对于认识鲁迅的辩证思维方法和与前代学者的承续关系是有重要启示的。

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五月由张家口新华书店出版）。这本专著相当全面地论述了鲁迅的思想，从文艺观、历史观、社会观到人生观和古籍整理，涉及各个方面。虽然还只限于连缀和叙述鲁迅的各类思想和言论，但是在鲁迅研究的初期阶段，这种对鲁迅思想各个方面的勾勒和描画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在鲁迅研究深入发展的时期，仅限于资料的连缀就不够了，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学术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这本书虽然不够充分，但是也时有闪光之见，提供了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见解。例如第六章“作品和鉴赏”第二节“辩证法”中有这样的分析：

所以有许多现象，单看表面，是无从理解的。所谓思维，就是从复杂的现象中，寻出事物的本质。这思维方法即辩证法，用辩证法去说明一切现象，这与抄袭公式或结论刚好相反。正确的结论或公式诚然不是空洞无物，也有其真实性的。例如关于水性的认识罢，水能淹死人，也能浮起人，这是水性的公式，这公式之所以有真实性，是因为水确实有这么两种作用。但只明白这公式，也依然无用的，必须实际用起来，学得运用水性的方法，即能够操纵它浮起人这种性质。因此所谓识水性，是含有知行合一这种说法的。至于识事物性，也是如此，并非引证公式而是实地去应用。即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鲁迅向来反对用公式往一切事物上乱套的错误，以为是新八股之作法，也是根源于此。

关于鲁迅杂文的这种辩证思维特征，过去徐懋庸和欧阳凡海等鲁迅研究家都进行过分析，但是象何干之的这种具体分析，以前还不曾有过，是一种新的推进。再如第八章“文化遗产问题”第二节“东西文化的交流”，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比较研究中观察鲁迅的地位，不失为一个新的角度。其中论述鲁迅翻译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事时指出：“这书的翻译，不但对于鲁迅的杂文，给了极大的启示，并且对于中国散文的发展也给了极大的影响。”见解也是非常中肯的。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九月上海开明书店印行，范泉译）。这本传记是日本作家小田岳夫原作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伪满州国“新京”（长春）由艺文书房出版了单外文的译本，以后三次再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上海星洲出版社又出版了任鹤鲤的译本。一九四六年九月范泉的译本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因为范泉的译本影响最大，也比较完善，所以我们收录了这个译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确实比较简陋，收集资料不够完备，有些地方用引文代替了艰苦的著述，使人读后有欠缺之感。另外，作者对杂文的时代意义的估计，对鲁迅先生幼年生活如何影响后期思想的理解，对鲁迅小说的分析和认识等等，都有欠缺之处。但是，诚如国内的一些评论者所说：小田岳夫“以一未曾谋面的异国人士而写这本书，他所根据的多半是有关鲁迅的作品及生活方面的资料，虽然，这此间或有疏忽错误的地方，了解得不够详细的地方，但他能忠实地研究鲁迅，热情地为这位中国文化的战士写传，这倒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于事者迷，旁观者清。小田岳夫作为一个异国的旁观者，也讲出了一些闪光的分析，值得我们中国的鲁迅研究学者深长思之。例如作者本书序章中曾对鲁迅和孙中山进行过这样的比较：“孙文是制造新中国的外表的人，而鲁迅，同他比起来，却是为制造新中国的实质而毕身忍受着苦

痛的人，以具有庞大的四千年背景的中国，纵使外表缺陷改革了，那实质却决非一朝一夕所能改革，这是容易想到的，而这一点也正是鲁迅的不幸。”的确，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内忧外患、危机痛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具有超越常人的敏感，他特别深刻地感到了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不幸和苦痛，感到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和危机，因而内心深处充满了悲凉沉郁和焦虑不安之感，炽燃着绝望、愤怒与不屈的情绪。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鲁迅作为一个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又作为一个现实的活生生的真人的性格心理特征，有助于我们从这一性格心理特征出发去正确地认识鲁迅的思想、著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言行，既不至于把他“神化”，又不至于产生误解而贬低这位真正的伟人。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效果是刺激中国学者加紧鲁迅传的写作，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一个日本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足够使我们领佩和羞惭，似乎在中国，这样的书还不曾有过。”既然不曾有过，就应该赶快写啊！

郭沫若的《鲁迅与王国维》（十月一日《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三期）。这是郭沫若继一九四一年写作《庄子与鲁迅》之后，又写作的一篇鲁迅与历史人物进行比较的文章。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是很必要的，这样有益于我们了解鲁迅与他前代及同代历史人物的相同处和相异处，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与历史传统的缘源关系。不过，郭沫若的这种比较还是初步的和表面化的，仅看到鲁迅与王国维之间表面的经历上和形式上的相同处是很不够的，还须深入、系统地剖析这两个历史人物在精神实质上的本质区别。王国维作为一个学者是伟大的，但是从中国近代革命史、思想史的高度来观察，王国维则根本无法与鲁迅相比拟。

李广田的《鲁迅的杂文》（十月一日《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三期）。这篇文章对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原因及其功绩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李广田指出：

鲁迅的杂文是诗，是政论的，又因为他的文字之深刻与含蓄而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强力，所以我们百读不厌，我们每次读它，都感到那种热辣辣的鼓舞，而绝不会象普通议论文尤其是普通政论那样使人觉得枯燥无味。至于他的杂文使我们清楚地认识了我们的时代，这一功绩，也不是一般的论文所可企及的。

有人以为鲁迅不写小说，而只写杂文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其实却不见得。因为鲁迅杂文是应了那时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的杂文，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实在比小说更重要。假设鲁迅没有他的杂文，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就只“鲁迅”这两个字，今日之所以启示了那么多的意义，主要的还是由于他的杂文。鲁迅去世之后，已很少有人再写他那样的杂文，或者就因为现在的社会与过去不同，不需要这样的杂文的缘故吧。

从时代环境和社会需要的角度，解释鲁迅的文学天才没有向长篇小说的形态发展，而向杂感文学的领域进军的历史原因，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假设鲁迅没有他的杂文，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这话说得的确非常警辟。

冯雪峰的《鲁迅回忆录》（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七日上海《文汇报》连载）。这是一篇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它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真实、详尽地记述了作者与鲁迅认识、交往的全过程，这些史实在作者解放后出版的《回忆鲁迅》一书里大多都已保存了，其最珍贵之处是解放后没有再见于书刊的许多真抒胸臆的感想和议论。例如雪峰写

他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产生的第一个印象时说：

我觉得他非常热情，然而又似乎有些所谓冷得可怕。譬如说，他号召青年反抗一切旧的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先为青年斩除荆棘，虽然受了一切明枪暗箭的创伤，甚至明暗的枪箭中就有来自青年的，也仍不灰心或叫痛，然而又似乎蔑视一切，对一切都怀有疑虑和敌意，彷徨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那时我觉得：在他的燃烧起人们心的诗与力的背后，使人们毫不迟疑地景仰和向往的他的磁石一般的教言的背后，就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捉摸的虚无和无限的冷酷。好像这用来燃烧青年们的爱和火，却是从一个无底的暗黑的冷窖里发出的，而他还将这冷窖也显示给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矛盾，可不是我能理解，我私心里还不以他为然。

这种最初的直观的感觉倒是鲁迅性格心理特征的真实反映。鲁迅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伟大思想家，最深刻地感受到了吞噬民族灵魂的种种弊端和不幸，因而也就忍受着远非常人所可理解的极度痛苦的煎熬，所以就呈现出这种大矛盾，从无底的暗黑的冷窖里发出燃烧青年们的爱和火。后来作者写自己一九二九年和鲁迅实际接近时说：

我当初不曾努力着理解那时先生的更深一层的精神状态，但也明白我所以能够很勇敢和自由地与他接近者，就因为他对柔石，对我，以及别的朋友和青年的接近，培养，及随意的闲谈，在我看来，对于他似乎就是一种日常的深刻的需要：为了他所感到的战斗和工作的人手的缺乏，同时这也体现为一种感情上的要求。

这种“感情上的要求”，正准确、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当时与青年相处的心理状态。其它，如关于鲁迅对创造社的感觉和“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所受深刻刺激的叙述，也都生动反映了鲁迅作为一个“真的人”的心理状态，是非常珍贵的。

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十月十八日《希望》第二卷第四期）。这篇文章反驳了认为“鲁迅没有创造出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的错误说法，指出：“如果离开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所积蓄起来的人类智慧底宝贵的路线，独创地弄出一个什么思想体系，那即使不是《大同书》的康有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梁漱溟，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森林哲学的泰戈尔或不合作主义的甘地罢了。鲁迅生于封建势力支配着一切的中国社会，但却抓住了由市民社会发生期到没落期所到达的正确的思想结论，坚决地用这来争取祖国底进步和解放。这是他的第一个伟大的地方。”“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斗争精神里面。”这是他的第二个伟大的地方。“最后，鲁迅底斗争还有一个大的特点，那就是把‘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冷酷的分析里面，也燃烧着爱憎的火焰。”以“没有创造出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这种貌似理论高超的断语来否定鲁迅，是鲁迅否定派一贯的说法，胡风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却简明有力地批驳了这种谬论，是有理论意义的。

胡征的《〈狂人日记〉的时代和艺术——读书随笔之一》（十月十九日《北方杂志》第一卷第五期）。这是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上较早全面论析《狂人日记》的文章。

虽然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出现了吴虞等人评论《狂人日记》的文章，但是大多是片断的、随感的形式，全面、系统地进行评析的文章还不多见，胡征的这篇文章则比较全面、系统。其主要特点是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出发，揭示出《狂人日记》的思想价值在于“主张要做‘真的人’”，“着重点是放在建设新的人生的意义上的。”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费德林的《鲁迅艺术创作的风格》（十月十九日《时代》第六卷第四十一期）。鲁迅的作品在国外、特别是苏联引起很大反响，陆续有不少苏联汉学家的鲁迅研究论文在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但是这些文章多数属于一般介绍性质，从学术理论上深入分析的文章很少。费德林的这篇文章则是在介绍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他指出：“中国和国外的批评界，都一致承认了鲁迅稀有的文学才能；若从他精神的素质来讲，若从他创作的风格和文体来讲，在他深刻的、富有思想内容和目标的创作中，他永远是一个最独创和最民族性的作家。”“对于‘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的关切，揭发出人的内心中的人性和优美的品质，这都是鲁迅创作中永远的特点。”“鲁迅想穿透进生活现象的底层，穿透到中国社会复杂而矛盾的情况的深处。”“从没有一分钟放弃了对于现实之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费德林还比较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与高尔基、契诃夫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指出鲁迅“具有着易于接受印象的天性和惊人的观察力”，这一点与高尔基、契诃夫是接近的，而鲁迅又“善于在中国文学中发挥这种现实主义，毫无疑问地，这种现实主义是有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基础的趋向的。”费德林的这些分析是从一个国外研究家的角度作出的，因此就更有益于中国人民对本民族伟大作家鲁迅的认识。

戈宝权的《鲁迅的作品在外国》（十一月二日《世界知识》第十四卷第十一期）。这篇文章相当全面地介绍了鲁迅著作在英、法、俄、日等国的翻译出版情况。戈宝权后来长期致力鲁迅作品在国外的专题研究，这篇文章是这一工作的开端。

楼栖的《论杂文》（十二月《文艺丛刊》第二期）。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对如何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新的历史条件下杂文应该如何发展这些始终悬绕于杂文界的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楼栖认为：“尽管杂文没有停止战斗，但它的战斗性还没有尽情的发挥。我们所看到的杂文，几乎都是政论的改装，正面的突击，讽刺性减少了，辛辣味没有了。一般的作品追随在时评后面，投掷去的手榴弹，仅仅碰到了狗的毛皮，到底不如恰恰扔中了鼻梁上的石子。杂文的精华，全在于它的讽刺，全在于作者见解的精辟和深入。鲁迅先生所开辟的道路，是一条历史的道路。”“杂文对于时评的追随，那正意味着作者的躲懒，和作者的战斗力的贫乏。杂文格式的渐渐趋于一致，并不是杂文的自然的‘定型’，反而是落在八股的窠臼里去了。杂文的成为武器，全在于它的灵活使用上，它的‘定型’反而是它的枷锁；因此，杂文的作者，还得在斗争中开辟新路，不仅要追上鲁迅先生，而且要超过鲁迅先生。”楼栖主张“多姿多采的现实，正要求多姿多采的杂文，画出现实里的各种各样的脸谱。”反对杂文“追随时评”，“定型”化，坚持杂文多姿多采的发展道路，这些见解不仅对当时的杂文创作情况来说是切中时弊的，而且对当前的杂文创作也是有重要启示的。

赵景深的《读鲁迅〈古小说钩沉〉》（十月十五日《文艺春秋》第三卷第四期）和《〈中国小说史略〉勘误》（收在《银字集》，上海永祥印书馆初版）。作者作为素养深厚的文学史家，既以详实的资料论证了鲁迅研治中国小说史的方法和功绩，又校

勘了个别疏漏，应该说是有意义的。这既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偏僻的领域，又是一个有功德、费功夫的事业，应予肯定和注意。

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上海、重庆、北平、东北以及苏联等国外的文化界纷纷集会纪念。周恩来、郭沫若等同志在上海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祭扫了鲁迅墓，充分反映了鲁迅先生在中国以至世界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和深远影响。

一九四六年度，除了上述介绍的鲁迅研究论著之外，还有一些短文，虽然在学术上没有提供新见解，但是从一侧面也反映了鲁迅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值得注意。这些短文是：

荒天、杨柯《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通信（七月十五日《萌芽》第一卷第一期）。荒天在来信中批驳了认为“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充斥的是些绝望、暗淡、怨尤、讽刺”这一当时流行的错误论调，认为：“‘在颓废的时候，在消极的时候，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便不颓废不消极，而想做事情。’这说明了什么？正说明了鲁迅先生的精神传达到我们的心里了。因此使我们勇敢和积极。”荒天建议要加强鲁迅研究的工作。杨柯在复信中肯定了荒天的看法，感到“明确地把鲁迅先生的著作分为两个时期来研究，分析他前期思想当中的优点与限制何在，后期思想又有些什么差异和更成熟之处，这样的工作的确是很必要的。”这封通信，生动有力地说明了鲁迅著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积极影响和群众要求加强鲁迅研究工作的渴望。

淑文的《〈鲁迅全集〉的故事》（十月十九日上海《联合日报晚刊》）。这篇短文记述一位年青的抗日游击队员在战斗中渡河时把行李、战马都丢了、独背着两本鲁迅全集坚决不放，从这感人的故事足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鲁迅著作的热爱。

庄淑的《从〈一件小事〉说起》（十月十九日上海《时代日报》）。这篇短文说的是作者几年前在英文本《国际文学》读了鲁迅的《一件小事》，曾经怀疑“作为国际文化交流机关刊物的《国际文学》，为什么特别选出这一篇东西来翻译介绍”。后来到了感情成熟的年龄，再读《一件小事》以及鲁迅别的产品，对于自己先前的“无知和狂妄”，“不禁引咎自愧，对自己起了绝大的憎恶。”“憬悟到：鲁迅文章的伟大，是在于他人格的真诚，而也正像一切古典作家一样，在鲁迅的作品里，我们才看到人格与文字真正打成一片，‘至大无边’，使我们只能感染到他灵魂的深切，而无法寻章摘句的去捉摸他文章的边缘！”作者最后说道：“‘现状下的经历，只有增加了我们的坏脾气，教我们一天比一天的瞧不起人，而只有鲁迅的这些书，却引起我们从坏脾气离开，重新起了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和尊敬。’就我个人的经验说来，在我读鲁迅作品的时候，的确有这种‘脾肉复生’的感觉。曾好几次克服了懦怯退缩，灰色绝望的念头，给了我无比泼辣的进取的勇气。”这篇短文通过自己亲身的感受，说明了鲁迅作品强大的思想艺术生命力。如果以现在流行的接受美学的观点考察、分析读者逐步接受、理解和消化鲁迅著作的过程，就会发现愈是到成熟的年龄、愈是不追求作品表面的浮华、愈是思想趋于深刻化，就愈是热爱和易于接受鲁迅的作品，就愈是加深对鲁迅崇高地位的认识。因此，象这一类的短文在鲁迅研究史和认识史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一九四七年的鲁迅研究论著资料发表、出版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在史实研究、《阿

《Q正传》研究、旧诗诠释这三个方面却取得了比较扎实的进展。

首先谈鲁迅史实研究。

这一年在史实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收获就是：许寿裳著的《亡友鲁迅印象记》由峨嵋出版社于十月份出版。正如许广平在这本书的《读后记》中所说的：“许季芾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同乡，同学。而又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时见面，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同执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在这种弥足珍贵的情谊之下，我敢于请求先生写回忆，谅来不是冒昧的。”许寿裳在这本书里，质朴、真切地记述了鲁迅从日本留学时期到在上海逝世三十多年的史实事迹，所述绝大多数是亲自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真实可靠，细致入微，从挚友的角度刻划出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活的鲁迅，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除了忠实记述史实之外，许寿裳还时时谈出一些真知灼见，启人深思。例如屈原《离骚》对鲁迅的影响、魏晋风度与鲁迅严正性质的相通之处等等，都是独具识力的。这一年六月，许寿裳还集结了过去所写的鲁迅研究文章十篇，总题为《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由台湾文化协进会出版。这些文献不仅回忆史实，而且对鲁迅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评论和研究，虽然理论上的探讨还是初步的，不够详尽，深入，然而论述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值得研究者注意。例如《鲁迅的人格和思想》一文中指出：“鲁迅的思想，虽跟着时代的迁移，大有进展，由进化论而至唯物论，由个人主义而至集体主义，但有其一贯的线索者在，这就是战斗的现实主义。其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这一评语，的确抓住了鲁迅思想方法的本质特征。

其次谈《阿Q正传》研究。

这一年《阿Q正传》研究的特点是侧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研究阿Q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性质。简赞雍的《阿Q社会之分析》（二月一日《新中华》复刊第五卷第三期），认为阿Q所处的社会是以血缘和家族关系为重的旧式的农业社会，在这一小规模的农业社会里，“几口或几十口的人家，耕种几块土地以维持生计——这就是他们生命线的内缘。数十家或数百家的同姓，聚族而居，守望相助——这就是他们生命线的内缘。经济上的内缘与外缘既均与家族息息相关，”所以“因贫富之不同，而此姓与彼姓有高低之分。”阿Q因为说自己姓赵，就挨了赵太爷的嘴巴。在这一旧式的农业社会里，必然产生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主要的原因，由于生产技术的简单，既不能以实际的物质胜人，只得以空虚的精神安慰自己了。次要的原因，由于一般农民心性的软弱——既缺少合作组织的力量，又缺少真正革命的意识，那末，在穷苦难过之时，只有用这些方法，找到心理上的出路。”过去的《阿Q正传》研究论文往往仅限于概括阿Q精神胜利法在精神、心理上的表现，较少深入地分析社会基础，这篇文章较前有所进展。周建人的《阿Q时候的风俗人物一斑》（四月十五日《读书与出版》第二卷第四期），则以绍兴的风土人情、真人实事具体地说明了阿Q所处的社会情状，有助于理解《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和阿Q典型形象产生的社会基础。端木蕻良的《阿Q论拾遗》（录自《论阿Q》，上海草原书店八月重版），分析更为深入、详实。端木蕻良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中国农村的破产和宗法社会的崩溃，又加自主的产业活动的城市建立不起来，使人们的出路完全阻塞。”“中国任何人都为着农村的瘦弱和城市的空虚，而失望而吃惊，所以，这种出不得乡，进不得城，上不得天，下不得地的

心理每个人也都有着。”“这些人，天天被推来推去，很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自己的命运，天天被这种由不得自己的环境所支配，所决定，象潮水里的水母一样。于是就引起一种主观上的质的变化。他就要求着在自己的性格上保持一种平衡使他在想冲出去什么而毕竟冲不出去时，而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常常给他一种似是而非的精神上的胜利，使他得到一度满足的欣喜。所以渐渐的尝到甜头，每到苦恼，就想起用它来作一种战斗的武器，用它来应付一切了。这时他就成了阿Q。”这种阿Q性是有阶级性的，“最多的恐怕要轮到我国鄙国可敬的小资产阶级这方面来了”，“阿Q性的社会根据是次殖民地的经济社会结构”，是一种“奴才哲学”。“阿Q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逃避现实。”“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能创造第二现实。”“第三个特点是欺骗现实。”阿Q的革命具有动摇和幻想性，是没有前途的。端木蕻良的这篇论文比较深刻有力，不仅从旧式的农业社会基础上分析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且从中国近代“次殖民地的深刻化”中探寻其历史因素，就更为全面了。用“逃避现实”、“创造第二现实”、“欺骗现实”这三个方面概括阿Q精神胜利法的特点，也更能抓住阿Q性的精神实质，更能体现鲁迅批判中国人以瞒和骗逃避现实的深刻思想。周莉冰的《〈阿Q正传〉的社会思想》（九月一日《历史社会季刊》第二期），重点分析了“阿Q出生的社会背景”和“从《阿Q正传》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认为“《阿Q正传》里的未庄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而未庄的一群‘鸟男女’也正是古国人民的一幅图画，在鲁迅先生的笔尖下，他已经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内幕和社会思想上的错觉全暴露出来了！”总之，一九四七年的《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进展是对阿Q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性质进行了更为深刻有力的分析，这或许是与当时思想界、学术界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有关的。

再谈鲁迅旧诗的诠释。

这一年十一月，司空无忌编的《鲁迅旧诗新论》，作为文怀沙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一辑，由重庆文光书店印行。这本书对鲁迅旧诗的诠释还比较简单，属于点评和偶感的性质，不过这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本鲁迅旧诗诠释，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是开山之书，弥足珍贵。这本书对鲁迅旧诗的诠释虽然不够详尽全面，但是注释者有感则发、无感则止、有言则长、无言则短的精神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这样做总比强不知以为知、唐塞成篇、任意拉长的作风为佳。

除了以上所谈的三点收获之外，一九四七年度值得注意的鲁迅研究论著资料还有：

石怀池的《论历史小说的创作》（录自《石怀池文学论文集》，耕耘出版社一九四七年出版）。这篇论文从历史小说的史的发展中考察了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并与郭沫若的历史小品进行了比较，开拓了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领域和思维空间，有不少启人深思的见解。

苏夫的《我的〈鲁迅全集〉》（十月二十一、二十三日《益世报》）。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什么研究论著，但是却真实生动地纪述了一位学徒工积钱购买、精心珍藏《鲁迅全集》的经过和战乱中失落《鲁迅全集》之后的惆怅之情，反映了鲁迅著作在广大群众中的深刻影响，自有其珍贵的文献价值。

许寿裳的《鲁迅的游戏文章》（十一月一日《文艺复兴》第四卷第二期）。这篇文章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解释了鲁迅的一些游戏笔墨，不仅有益于正确理解这些诗文含

义，而且有益于全面认识鲁迅的性格心理，了解到他除了严正、冷峻的一面之外，还有愉快、机警的另一面。

一九四八年的鲁迅研究取得的主要收获有四项：王士菁的《鲁迅传》、雪苇的《鲁迅散论》、林辰的《鲁迅事迹考》三本书和胡绳的论文《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这年一月，王士菁著的《鲁迅传》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这本近四十万言的书是由我国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鲁迅传记。诚如许广平在序中所说：“胜利之后，有机会看到这本真正自国人写的鲁迅传。他把中国历史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鲁迅生平经过，从头正确地、客观地寻找出它的所以然。惟其如此，才能了解鲁迅行文、处世的真意。这正是我多年心里所愿看到的，而希望竟在眼前实现，这一次欣鼓舞，是不能言语形容的。”又如周建人在后记中所说：“觉得作者写这部稿子，很用了许多力气与时光。他读过鲁迅的文章及有关的书固不必说，他更读过鲁迅去世后差不多所有在刊物上发表过的讲到他的文章。因此说到关于鲁迅的事情时都有所据，毫不意度或臆造。”

“把中国历史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鲁迅生平经过，从头正确地、客观地寻找出它的所以然。”这两段评语，中肯、恰当地概括了这部鲁迅传的特点。虽然这部书还有引证过多等不足之处，但是作为我国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能写得这样系统、完整、清晰、谨严，确实并非易事，其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四月，雪苇的《鲁迅散论》一书由光华书店出版。这本书集印了雪苇自一九三六年以来所写的六篇鲁迅研究论文，其中的《论〈野草〉》一文更值得注意。雪苇在这篇论文中认为：《野草》的“阴影”只是“一时的心之波动与心之一角的内在斗争”，“至于要衡量它底位置，那这一切还远远不是一九二四、二五年鲁迅思想的全貌；甚至不唯不是当时他的主要思想动态，而且只是当时他思想的内心转动的一部分，极为渺小的一部分。”雪苇还把鲁迅与《野草》写作同时的其它思想论文排比起来观察，充分证明鲁迅在写作《野草》的同时，还写了许多“极为结实的号召战斗的文字”，当时鲁迅的主要思想动态是积极的和战斗的。过去的《野草》研究论文往往是就《野草》论《野草》，没有注意把《野草》放在鲁迅当时整个创作活动的范畴内、与同时写作的战斗杂文比较对照着观察，所以容易得出孤立、片面的看法，雪苇的这种观察、分析法是比前人进展了一步。

七月，林辰的《鲁迅事迹考》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集印了林辰自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间所写的十篇鲁迅史实的考证论文。一九四五年夏末，搜集成书，曾交书店出版，后因书店蚀本关门没有印成。一九四七年，经过修正增补交上海开明书店，于一九四八年七月才正式问世。这本书写作时，曾得到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和孙伏园的很大帮助，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许先生以高龄硕德，而对于一个后进的请益，往往不吝用长达二、三千字的复书，赐以周详的指教；孙先生在函札和口述之外，并为这小书作序言；”因此，这本书关于鲁迅事迹的考证很多地方来自第一手材料，是真实可靠的。而最值得赞评的是作者的治学态度和考证方法，孙伏园在序中这样称许道：“罗列材料以外，便是方法的说明。传记工作的初步条件，只是方法的细密与谨严。等到传记写作的时候，不能再有方法的说明了。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都代表了极细密谨

严的方法。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排列材料的方法，辨别材料真伪的方法，都是极细密谨严的。”的确，这种极细密谨严的方法正是《鲁迅事迹考》的特点，也是林辰治学的最大长处。这本书不仅解决了鲁迅生平史实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为鲁迅传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在鲁迅史实研究领域具有开创道路、树立学风的意义，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一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

九月，胡绳等著的《鲁迅的道路》一书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作为首篇发表的是胡绳的论文《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胡绳的这篇论文是继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之后、论述鲁迅思想发展问题的重要论文之一，其意义在于：（一）结合四十年代后期的新形势，坚持并进一步阐发了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论述鲁迅思想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二）对当时流行的另一种对鲁迅思想发展问题的看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看法：“或者是片面地强调鲁迅一生中首尾一贯坚持不移的精神，却忘记了鲁迅的伟大更在于他敢于以新的立场来冲破他在旧的立场上的局限性。也有把鲁迅思想的发展描写为只有量的扩充，却不愿承认其间有过质的转变。”“或者是片面地强调鲁迅的主观战斗精神，好像鲁迅是天生就有着超人的天才，就有着超人的坚强的主观力似的。”“或者是片面地强调鲁迅思想由生活的直觉经验出发的特点，却不愿意去看出，鲁迅并不单靠直觉经验而到达他的思想的高度，而是通过直觉经验更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或者是单纯歌颂鲁迅前期的个性主义思想，或者以为，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有着独往独来、孤身作战的精神；或者以为，鲁迅的战斗力量只在于暴露黑暗，怀疑一切。”“总之，这一类的观点之产生就是由于只能认识，只能亲切鲁迅前期思想中的个性论、进化论，和唯心论倾向的因素的结果。”（三）从鲁迅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来说明为什么“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说明鲁迅的后期思想达到了异常辉煌而完全合乎科学的高度，“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是沉着稳定的坚毅的进军，是对于通过一切阻碍妨害而必将到达的前途的巨大信心，是与科学的分析与批判相结合着的分明而热烈的是非爱憎。”胡绳的这篇论文对于科学地认识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后期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鲁迅研究学术史、特别是鲁迅思想发展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九四八年度，值得注意的鲁迅研究论著还有：

朱自清的《鲁迅先生的杂感》（五月十六日《知识与生活》第二十七期）。朱自清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鲁迅杂感的艺术吸引力在于“理趣”，也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这一看法在鲁迅杂文研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很多人都偏重于推崇和模仿鲁迅杂感形式上的幽默和讽刺而忽视内容的内在价值，朱自清的“理趣”说则一反这种浅薄的片面看法，比较深入地揭示了鲁迅杂感内在的美学价值，这对于扭转鲁迅杂文研究和杂文创作中的某些错误倾向，把鲁迅杂文研究提高到科学的和美学的高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胡风的《以〈狂人日记〉为起点——为文协五四特刊写》（录自《五四谈文艺》，全国文协总会五月出版）。胡风的这篇文章是以主客对话体的方式进行论述的，主要观点是：（一）五四文化革命，“在思想革命的角度上，应该以一九一八年为起点，这一年，彻底的民主革命派发布了他的战书，树起了他的底大旗，我们应该把《狂人日记》底发表当做标志。”这一观点，实质上后来被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接受，所承认了。

(二)阐发了原则性与丰富性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反对“忘记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反转来又把实际的丰富性压死”的直线观点,主张“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在原则性的钢绳上面吊死,也不要丰富性的海洋里面淹死”。中心点是“原则性得通过丰富性,丰富性得通到原则性”。回顾六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就会感到胡风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包含相当大的真理性。我们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某些左的东西,从思想方法上分析,不就是“忘记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反转来又把实际的丰富性压死”吗?(三)指出五四文化革命孕育出鲁迅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认为:“鲁迅底战绩当然是历史要求也就是必然性底反映,但历史要求能够遇到了鲁迅,通过他底战斗而被那么快那么坚强地反映了出来,这却是带着偶然性的。”很多年来我们往往偏重历史造就鲁迅这种必然因素,而忽视历史遇到鲁迅这种偶然因素,忽视鲁迅个人的天才条件和独特个性,回顾一下胡风的这篇文章,对于纠正这种片面性是有意义的。

田茂新的《论鲁迅后期无须再有创作》(十月十九日重庆《新民晚报》)。这篇文章虽然较简短,论述的问题却值得注意,其意义在于针对因为鲁迅后期只写杂文不写小说而惋惜的普遍思想提出看法、阐释了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指出:“文学艺术表现的形式,须视表现的内容与时代的需要而定,并非天生的,一成不变的,而作品的价值完全要看作品的社会意义或社会效果如何,鲁迅先生的杂文,在这个意义上比之《战争与和平》、《浮士德》等巨著,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因此,鲁迅先生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绝不在托尔斯泰、哥德等之下。”从表现的内容和时代的需要上来分析鲁迅杂文的价值,是会有说服力的。当然,这篇文章分析尚过于简单,以后的研究者有从这一角度出发进行详审阐发的必要。

茅盾的《论鲁迅的小说》(十月《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茅盾以前写过很多有份量的鲁迅小说论文,这一篇较前又有新的进展,从更高的思想观点上综合考察了鲁迅小说的全貌,主要观点是:(一)《狂人日记》“这篇划时代的作品,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作品又提示了鲁迅前期的基本思想及其写作态度。”“有点象是他的小说作品的总序言。”他站在不同于西欧的旧人道主义、而和高尔基一样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控诉“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因而他的小说“和巴尔扎克、狄更司、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现实主义’颇不相同,而应当和高尔基的早期作品相比较,也就是从这一点看来,我们有理由说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二)“如果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反映现在并须指示未来,不但要描写和批判‘将死的’,并须描写‘方生的’——旧社会胎内的新社会的萌芽,不但要从今天还是显赫异常的旧势力看出它必不可免的覆败,并且还须从今天尚居于劣势的或尚在潜伏状态的新兴力量指出它的一定胜利,那么,《呐喊》和《彷徨》与其把它们归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名下,毋宁把它们归入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罢?而且这样做,也未必对于鲁迅的光荣有所损罢?”当然,“《呐喊》与《彷徨》即使没有显明地指示未来,而只是批判现在,但它们和西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它是比巴尔扎克他们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更高于战斗性,更富于启示性的。”(三)鲁迅小说的一个主题是:“敌人之所以还有力量,由于人民之尚信它有力且对于自己的力量无信心。”“这就不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所有的,而我们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也不是没有理由